

#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 ~ 1949)》

13位ISBN编号：9787108010230

10位ISBN编号：7108010232

出版时间：1997-06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陈星灿

页数：35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

## 内容概要

中国史前考古学是近代的新兴学科之一，它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客观的历史背景，探讨这一过程的由来，对正确理解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以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 and 客观的论述，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本书长达二十余万言，有史实，有论述，不失为考古学史佳作。为考古学、古代史研究者所必读，对近代科学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

## 作者简介

陈星灿,1964年出生于河南长葛县。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199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已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编译出版了两部反映国外考古学发展方向的论文集:《当代国外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和《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论文《安特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早期研究》获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

## 书籍目录

序

导言：关于史前考古学的若干一般问题

第一节 “史前”概念的由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节 史前史与史前考古学的联系和区别

第三节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的研究简史及分期

第一章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萌芽（1895 - 1921）

第一节 中国文化西来说及其分析

第二节 近代考古学知识的传播

第三节 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探险和考古活动

第四节 金石学及其向近代考古学的过渡

第五节 中国古代对史前遗物的认识

第二章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1921 - 1931）

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滥觞

第二节 主要考古活动的概述和分析

第三节 中国史前文化及其西来假说的由来和分析

第四节 技术方法上的得与失

第三章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1931 - 1937）

第一节 史前考古活动的蓬勃兴起

第二节 二元对立——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新阶段

第三节 地层学方法的完善和类型学方法的初步形成

## 精彩短评

- 1、陈星灿先生敢啃这么硬一块骨头，真的是太有勇气了。那个年代的学者先生们，真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啊。
- 2、史前考古学史，这么块硬骨头也敢啃.....陈星灿,,,,,,好吧好吧
- 3、诚然，摸索与错误可令人思辨。但此书属于对国内史前考古有足够了解的人，说是考古盲入门的当真有认真看书？既是研究学术史，许多方法以及观点都是原始且建立在不断推翻与被推翻上的，没有足够功底只会越看越糊涂。入门自当通读案例与方法啊，有了基础才能辩证地看此书中提到的发展。但逻辑清晰深入浅出是事实。
- 4、挺长知识的
- 5、深入浅出，句句有考，考古盲福音。
- 6、考古史，或者叫学术的学术史；陈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沉得住，做了这么大的一个题目。，几年前，读了他与别人合作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问题。满是争议的议题。
- 7、老师兄的博士论文，很牛啊
- 8、已购
- 9、考古学史。
- 10、一遍又一遍的温习，好赞！可是为啥没有结语.....
- 11、史前研究必讀書目。書中記錄了中國考古學誕生前，誕生之初的不斷求索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在當時的材料局限下的兩個學術課題，中國的考古地層學與類型學的誕生過程。作研究者，必須了解研究學門之前世今生，方可明了每個時期的研究主題與局限，方能鑒古而今，甚至推測未來的學術動向。並以此督促自己。
- 12、我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浓厚兴趣，即发端于此书。
- 13、精彩！史前考古学史的完整述评，尤其是概述一章，颇见功力。张光直作序。
- 14、2015-03-16
- 15、既是导读又是论著
- 16、这本可以和jx老师的《暗流》合称，中国50年代前考古学的主流与非主流 ~ ~ ~
- 17、资料

1、本書是陳星燦先生於1991年在社科院寫就之博士畢業論文修改而成，是至今為止少數幾部中國考古學史的研究著作之一。而且，陳先生又專注着筆於中國史前考古學史，其角度聚焦於1949年前中國疆域內的史前考古事件及考古學研究課題，與陳洪波先生以史語所為中心之考古學史，與徐堅先生以“暗流”的發掘事件為中心的考古學史在主體的側重上有較大差異，因此，這是一本研究中國史前考古學的學者繞不過去的一本著作，不讀則難以瞭解自身所作之考古學研究的前世今身。1895-1949是中國歷史上的多事之秋，歐、美、日諸國都對這片土地虎視眈眈，他們的勢力也造就一些冒險家與考古學家進入中國。他們當中一部分以考察為名，以掠奪為實，給中國文化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現在諸多重要文物散落世界各地，多是這一時期慘遭掠奪之果。不過，他們當中也不乏純粹的學者，他們對保存中國文化，建設中國考古學有值得肯定的功勞。但他們所記錄之文獻多以本國語言書寫（英、法、日、瑞、俄），陳先生在此書中需要大量處理這些不同語文的研究資料，確實是困難重重。全書讀畢後，我實在驚訝於陳先生翻出了很多重要的外文材料，結合大量的中文材料構成了翔實的敘事，並對這一階段重要的史前考古學事件，課題，方法加以詳細論述，有史有論，掌控得恰到好處。正如張光直先生於序中所寫，陳先生“一定是個書癡”，只有書癡才能把材料挖到這個深度。全書的內容包括導言與四個章節。導言簡要理清“史前”，“史前史”，“史前考古”的基本概念，並簡要介紹其在中國的出現與傳播。後對中國史前考古學史做了一個簡單的學術回顧，並在參照諸家分期的情況下，融入作者自身理解，重新對中國史前考古學史進行分期。可惜作者在檢視諸家分期時，只有羅列，未有指出各家分期之要點為何，缺陷在於何處，因而看到作者的分期時，並不清楚他的分期較前人之優勢為何？但個人認為，作者所選取的數個節點是十分合理的。一是1921年安特生於沙鍋屯與仰韶村的發掘，此乃中國境內第一次的正式考古發掘，有着里程碑式的意義。二是1931年後崗三疊層的發現，這標誌着中國考古學的地層學從水平層位轉向自然層位，正式把地質學中借用過來的地層學融入到考古學的體系當中。三是1937年抗戰爆發，七七事變後周口店的發掘也被迫停工，其後只有西南地區及西北地區的小規模的調查與發掘。作者以上述三個節點，把1895-1949年的考古學史分為四期，每期各分一個章節論述，如此安排也是十分自然合理。第一節是從1895-1921年，此間為中國史前考古學之萌芽期，算是隨後數章的前置舞臺。例如此期已誕生“中國文明西來說”的命題，受極端傳播論思想的影響，一些西方學者根據中國文化之文字，政體，風俗，神話傳說等方面，與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中亞文明作簡單的連結，以此提出數種中國文明西來之假說，但多是臆想之主張，缺乏可靠的依據。在此期間，近代考古學知識開始傳入中國，其源頭多為日本譯作，為之後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奠定了知識基礎。受此影響之下，自宋代起興盛的金石學也逐漸轉向近代考古學。此外，陳先生簡要介紹了此間外國探險活動與考古調查活動，並作出十分中肯的評價。隨後，第二、三章算是全書着墨最深的主體部分，畢竟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以前是中國考古學誕生後極大發展的一個階段。第二章是中國考古學的誕生期，以安特生發掘沙鍋屯和仰韶村為標誌。這一階段的大部分考古工作主要是由外國學者承擔的，而這些外國學者可以分為四類，一是受聘於民國政府的，如安特生，步達生，德日進，他們的活動是在民國政府的許可下進行的；二是中瑞西北考察團成員，包括斯文赫定和貝格曼；三是外國考察團與傳教士，如美國自然博物館與桑志華，那爾遜，葛維漢等人；四是東北、華北和臺灣的日本學者。他們當中多是科學家或人文學者，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故他們的活動為中國史前考古留下了最初的一批重要資料，並培養了一批中國本土的考古學家，如裴文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雖然李濟與史語所考古組的發掘中心在於殷墟，但他們也發掘了一些新石器時代的重要遺址，如西陰村，城子崖等。這一階段在中國史前考古領域中最為活躍的應屬安特生，他在發掘了仰韶村後，對於彩陶的脈絡及中華文化之源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了探求這一學術課題，他進入西北調查與發掘了不少重要遺址，與卡約，辛店，齊家坪，馬家窯，寺洼山，馬廠塬，沙井等，為其提出之“中國文化西來說”提供了大量考古材料。1931年後的史前考古活動蓬勃興起，中國人開始大量活躍於史前考古的舞臺，如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於周口店的發掘，史語所考古組於河南，山東，山西等地的史前考古活動，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史前考古於陝西的活動，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與吳越史地研究會在長江下游的考古工作。此外，日本人基本壟斷其盤踞的東北和臺灣地區的田野發掘，西方學者只有少數的發掘。據1932-1937年的著作統計，中國考古學家的研究著作也是大幅上升。因此，“蓬勃興起”這四個字確實是這一階段中國史前考古發展的最佳寫照。在1949年以前，中國史前考古學的研究課題主要存在兩個，一是針對彩陶的源而產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提出者為安特生；二是針對



黑陶與彩陶的關係而產生的“中國史前文化二元對立說”，提出者為梁思永。簡單地說，這兩個課題的研究核心不外乎考古學文化的時空關係問題。對於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其關鍵的核心在於如何判斷西方彩陶（安諾，巴比倫等地所出之彩陶）的相對年代早於中國彩陶的相對年代，而傳播路徑上的自西向東也必須達成甘肅彩陶的相對年代早於河南彩陶的相對年代。但安特生僅從紋飾的簡繁來判定中心與邊緣，或僅從器物相似，器物出土之有無等角度來論證相對年代問題，這便成爲了他的研究中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國文明西來說”難以立足的關鍵。現在我們知道，欲判斷文化相對年代問題，離不開地層學與類型學這兩個“輪子”。但從當時安特生的發掘情況看，水平層位的發掘未能提供準確的地層學證據，故其在仰韶村發掘的仰韶文化遺物中出現了“鬲”等器物。因此，在方法和技術的侷限下，他無法分辨甘肅彩陶與河南彩陶的相對年代關係，錯判齊家與仰韶的相對年代關係也是在情理之中。在發展期，中國考古學的兩個輪子，即地層學和類型學開始初步出現。陳先生在這一階段所提的是“地層學的完善”。但實際上，在中國考古學的誕生期，無論是安特生發掘仰韶村，還是李濟發掘西陰村，史語所發掘城子崖，都尚未使用“以土質土色爲首要劃分標準”的地層學，所採用的方法仍爲地質學的水平層位劃分法的地層學，所以才會引發“聚訟不休”的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關係的課題。這是水平層位發掘的侷限性。直至1931年後，在長期積累田野經驗後，以土質土色劃分地層的地層學終於在後崗三疊層中展現了其優勢，雖然不清楚梁思永在主持城子崖第二次發掘時是否使用了土質土色劃分地層的方法，但他在後崗的發掘的確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並成爲之後殷墟發掘的指路明燈。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除了Kidder，很少有人主張按土質土色劃分地層。梁思永曾受業於Kidder，並爲中國考古學帶回了世界上最爲先進的發掘技術，隨後，又在殷墟的數次發掘中逐漸改良，真正使源於地質學的地層學考古學化和本土化。因此，在發掘方法與思想上，若追溯至上世紀30年代，中國考古學應是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這恰如經濟上民國時期的黃金十年，中國考古學也迎來了極大發展的黃金十年。另一方面，類型學的研究開始出現。但仍停留在“有無原則”，“頻率原則”和“相似原則”，與今天我們所指的類型學相去甚遠。但值得注意的是，巴爾姆應用器物類型的演化原則對半山和馬廠的陶器進行分類，從此開始了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對器物形制的分類與比較。此外，與巴爾姆有着同樣影響力的，應是蒙特留斯《東方和歐洲的古代文化諸時期》第一卷《方法論》在中國被翻譯。此書的方法在日後大大影響了中國考古學的類型學研究。1937年後，迫於日軍侵華戰爭的全面開展，大部分的考古工作都被迫停止，其中包括一些考古工作持續了多年並有重大發現的遺址，如周口店，殷墟等。但在艱苦的八年抗戰期間，中國考古學家仍不畏艱難，在西南和西北開展考古調查。這些調查，很多是以考古學家一人之力，伴一兩位助手，在艱苦的環境中徒步進行。家國之患，艱苦之境，都未能阻止這些考古學家嚮往田野。他們的驅動力究竟是什麼呢？是振興民族之責任？是“文化救國”之豪情？還是單純追求考古發現時那一剎的悸動？我們已無從得知其動機。我相信，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艱苦，在對前輩學者肅然起敬之餘，我們可以做的，也許就是在自己年代的艱苦下，把這份考古人的執着延續下去。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階段日本學者在中國本土所進行的考古學研究，其數量之多，地域之廣，是中國與西方學者均無法比擬的。因此，日本學者在這一階段的活動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而“兩大課題”的研究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例如，在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年代問題上，吳金鼎正確指出了不招寨的龍山文化性質，並區分出了仰韶村遺存可能存在兩種文化性質，但卻把它看成是同一文化的延續，仍未能突破梁思永的研究體系的窠臼。而劉燿則更進一步確定提出，仰韶村遺存存在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兩種遺存，並否定混合文化存在之說。這是對梁思永說的直接挑戰。然而，他並未能跳出梁思永說的框架，也未能解決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年代問題。安特生也逐漸發現了一些問題，並提出了仰韶文化可能早於龍山文化。但他仍堅持仰韶村遺存同屬一個文化。這一問題則在1953年水野清一與關野雄的研究中才有突破性的進展。他們在廟底溝二期文化發現之前，提出了龍山文化晚於仰韶文化的命題。雖然，1949年以前的研究工作未能直接指出仰韶龍山的關係，“東西二元說”仍是主流，但吳金鼎和劉燿正確地區分出龍山文化的遺存，已經爲今後解決仰韶龍山的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此外，1945年夏鼐在陽洼灣的發掘，從地層學的證據確定了齊家文化晚於馬家窯文化，直接推翻了安特生的六期說。他根據此次發掘的成果，認識到辛店與寺洼的年代可能是同時，直接擺脫了在早期單線進化論基礎上建立的直線發展模式，成功地認識到了地區文化發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這也是否定“中國文化西來說”的最有力證據。其實，梁思永提出仰韶龍山的東西二元說就已經是對“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反動。安特生晚年雖然對其六期說的絕對年代進行修正，但仍死守陷入困境中國文化西來說。在“出土爲王”的考古學科，在諸多證據的反對下，中國文化西來說已成強弩之末。在這一階段，地層學與類型學也進一步得到完善。其中，個人認爲夏鼐在陽

注湾發掘的齊家文化二號墓是這一階段地層學發展的里程碑。這次發掘，確定了墓葬填土中的遺物年代早於墓葬年代的地層學思想，並因此得到了馬家窯文化早於齊家文化的地層學證據。如把這一思想進一步引申，可理解為遺蹟單位填土（墓葬填土）的年代與遺蹟單位的“實際內容”（如墓葬的“實際內容”為墓主骨骼和隨葬品）的年代並不一致，應作兩個遺蹟單位處理。這是一種相當先進的地層學思想，有點像今天國家文物局的田野規程中的地層學思想（實際上源自英國context的發掘思想）。夏鼐曾留學英國，並於皮特里和惠勒兩位大師的指導下，參與過英國，埃及和巴基斯坦的發掘，也曾直接參與梅登堡山城的發掘，這是惠勒在考古方法論上作出重要貢獻的一個遺址。藉由梁思永和夏鼐引入的西方考古學發掘技術，中國考古學的發掘技術在當時已走在世界前列。此時，類型學方法也得到進一步完善，一方面表現在李濟對殷墟陶器的“定量式”的分類；另一方面則是蘇秉琦對鬥雞臺溝東區的陶鬲的類型學研究。後者的研究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十分深遠，今天我們仍沿用蘇公的類型學思想。但讓人覺得可惜的是，全書至此戛然而止。本來還期待有最後一章對全書的總結與拔高，但看到的最後的頁數都是參考書目，讓人略感失望。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